

精神鑑定中認知偏誤 影響及改善途徑之初探 —以臺灣刑事訴訟為中心*

Effects of Cognitive Bias in Forensic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and Possible Solutions:
Focused on Taiwanese Criminal Procedure

何奕萱 Yi-Hsuan Ho**



摘 要

司法精神鑑定為刑事訴訟中重要之一環，然該等鑑定結果則可能於無形之中受認知偏誤之影響，並進一步影響法院之審判結果。認知偏誤之樣態繁多，而針對司法鑑定之研究多集中於確認偏誤、代表性捷思法、錨定效應及結盟效應，故首先針對此些樣態為介紹，後進一步集中於確認偏誤存在於臺灣司法精神鑑定中之可能為討論，並簡要提出可能之改善途徑。

*本文之初稿係為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修習吳建昌教授於臺灣大學法律學院開設之「心智科學與法律專題研究」之期末報告。於學期結束後，與吳建昌教授進一步討論該初稿有何應改善之處，十分感謝吳教授特別於百忙之中撥冗，並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另期刊匿名審稿人提供多珍貴修正建議，筆者受益良多，以上均特此感謝，惟文責筆者自負。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研究所民法組碩士生（Master Student, College of Law, Taiwan University）

關鍵詞：精神鑑定（forensic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DOI：10.3966/241553062020060044014

Angle

Forensic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riminal procedure. However, these evaluation results might be affected by cognitive bias, and thus affect the rulings of the court. Whil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cognitive bias, the researches regarding forensic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mostly focus on confirmation bias,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s, anchoring effect, and allegiance effect. This paper therefore first briefly introduces these four types of bias, then focuses on the possibility of confirmation bias existing in forensic 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in Taiwan, and discusses the possible solutions.

壹、前言

於刑事訴訟中，有諸多程序可能需仰賴對被告精神能力或狀態判定的結果方能進行¹，然因法院對精神能力或狀態之判斷缺乏專業，故多仰賴鑑定人對此進行鑑定並出具報告於法院。本文以「精神鑑定」為關鍵詞，並限定於法院見解中出現者查詢，各法院刑事判決總數即有16431筆²，可見現行刑事實務對精神鑑定之倚賴甚深。

鑑定，係指有特別知識經驗之人或機關、團體，就特別需要特殊知識經驗之事項，予以鑑識、測驗、研判及斷定，提出報告，以作為訴訟之證據資料³。臺灣刑事訴訟法將鑑定列為

1 如判斷被告是否具有受審能力、責任能力、受刑能力，或用於量刑時作為審酌標準等。

2 最後查詢日：2019年3月2日。

3 此定義普遍見於實務判決，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732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61號、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91號刑事判決等。

法定證據方法之一種，依刑事訴訟法第198條及第208條，於偵查中由檢察官，於審判中則由審判長或受命法官，選任自然人或囑託機關鑑定。然為因應實務需求，亦承認基於檢察一體原則，由檢察長對於轄區內之案件事前概括選任或囑託，以便轄區內之司法警察（官）對於調查同類案件時，得及時送請事前已選任之鑑定人或囑託之機關為鑑定⁴。其以言詞或書面提出之鑑定報告，並須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06條第1項、第208條所規定應包括「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之法定要件，方屬同法第159條第1項「法律有規定者」之傳聞例外，而具有證據能力。雖然鑑定經過之記載並無一定格式，亦不以另立鑑定經過欄為必要，但鑑定書面如僅簡略記載鑑定結果而未載明鑑定經過，即與法定要件不符，法院應命補正，否則該鑑定書面即不具備證據資格⁵。然此些要件僅在賦予鑑定報告有證據能力，至於其證明力如何，應由法院本於確信合理判斷。

刑法第19條有關行為刑事責任能力有無之判斷標準，係採生理學及心理學之混合立法體例。生理學部分，係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心理學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係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⁶。有論者蒐集105年全年度高等法院及各分院有判斷刑法第19條第1項或第2項之責任能力之判決，有囑託精神鑑定者共有64件，而法院與鑑定意見就生理學要件認定一致者即為64件；於鑑定意見有判斷心理學要件者有61件，而此部分法院意見與鑑定意見一致者為54件；於鑑定意見有判斷責任能力者有58件，而此部分法院意見與鑑定意見一致者為51

4 吳燦，鑑定書面之證據能力，月旦法學教室，186期，2018年4月，26-27頁。

5 同前註，25-26頁。此亦為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63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408號、92年度台上字第2282號刑事判決所宣示。

6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90號刑事判決。

件⁷，可見現況下鑑定報告之結論對法院影響力之高。然，縱出具精神鑑定報告者均為該領域之專家，既鑑定為一須經鑑識、測驗、研判及斷定之決策行為，該等專家即均有受認知偏誤影響之可能。故本文試從認知偏誤之角度，探討精神專家於鑑定中可能受到之影響，並進一步試從刑事程序中提出可能緩解之道。

貳、認知偏誤於司法鑑定中之影響及態樣

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雖已為心理學家研究數十年之領域，然仍缺乏一明確定義⁸，其為何會產生、有哪些樣態、應如何預防等，仍為心理學家所繼續研究之內容。而於司法鑑定中，不論係指紋、DNA，亦或精神鑑定，仰賴的縱然是科學專業，本質上仍是根據不同的跡證或內容，以科學方式作出鑑定結果的認知、決策過程。此既同為一認知過程，進行鑑定的科學專家於鑑定過程中，亦可能如人類的其他決策行為，受認知偏誤影響⁹。本節將簡略介紹文獻上對司法鑑定中可能存在之認知偏誤樣態，以證立認知偏誤對司法鑑定確可能產生影響。

7 游舒涵，論精神鑑定作為責任能力判斷之架橋——以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為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年，58-63頁。

8 Joseph J. Lockhart & Satya Satya-Murti, *Diagnosing Crime and Diagnosing Disease: Bias Reduction Strategies in the Forensic and Clinical Sciences*, 62(6)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1534 (2017).

9 有論者即針對司法鑑定人於鑑定過程中可能受到認知偏誤之影響，設計出The Hierarchy of Expert Performance模型，分析並試圖降低鑑定專家的認知偏誤，參：Itiel E. Dror, *A Hierarchy of Expert Performance*, 5(2)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121-127 (2016).

Angle

一、確認偏誤

心理學界對於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多有討論，現並已多有實驗證據顯示受試者的期望會影響其對影訊及音訊的詮釋與理解，且受試者對此種現象可能完全沒有意識。套用至司法鑑定，則有實驗結果顯示於測謊判讀中，鑑定人對於測謊結果的判讀會受到其本身對於受測謊者是否在說謊的主觀認定影響。該實驗以10位以色列警方的測謊專家為受試者，每位鑑定人均須判讀14份經獨立測謊專家判定為結果不明確的測謊報告。於前7份報告，實驗者告知鑑定人，報告中的受測謊者已於之後認罪；於後7份報告，則告知鑑定人，於測謊後有受測謊者以外之第三人認罪。實驗發現，縱然全部14份報告均經獨立的專家判定為結果不明，但前7份報告明顯更容易被鑑定人判定受測謊者在說謊。惟此操弄結果僅於測謊報告之結果為不明確時有效果，若該測謊報告得明顯判讀，則鑑定人的判讀結果並不會遭實驗操弄所影響¹⁰。

又於指紋鑑定中，有實驗以5位富有經驗的指紋鑑定人為受試者，給予各該鑑定人不同的指紋鑑定。每位鑑定人所鑑定的指紋均為其於數年前鑑定過且認定該指紋與被告相符的指紋，惟此事實係各鑑定人所不知。於鑑定開始前，實驗者告訴鑑定人系爭指紋是從一涉及錯誤指認的高矚目案件中所取得，某程度暗示指紋的鑑定結果應不會與被告相符。於鑑定人受此暗示後再進行鑑定之結果，5位鑑定人中僅有1位判定的結果是相符，其他均為不相符，與其數年前鑑定之結果相違

¹⁰ Eitan Elaad, Avital Ginton & Gershon Ben-Shakhar, *The Effects of Prior Expectations and Outcome Knowledge on Polygraph Examiners' Decisions*, 7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279-292 (1994); cited from Saul M. Kassir, Itiel E. Dror & Jeff Kukucka, *The Forensic Confirmation Bias: Problems, Perspectiv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 2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46 (2013).